

第二个问题是，一定要坚持社会学的实证原则，切实地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创造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我体会，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费老指出，“我们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少，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准确、深刻地提醒我们要丝毫不懈怠地努力。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对中国社会很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故此不可避免地会走很多弯路。社会学承担着沉重的使命，要以自身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要贯彻社会学的实证原则于各门社会科学，真正切实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加深对中国的认识，才能为我们祖国做出贡献。不坚持实证研究，凭想象提出各种主张，会损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实证原则之重要性超出社会学学科，而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它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原理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具体表现。总的精神是实事求是。回顾我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历程，深深感到偏离实事求是原理的力量是何等地大！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偏离实事求是原理，都是没有真正从实际出发。我感到，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雷洁琼、家师徐雍舜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一直坚持的实证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夸夸其谈的空疏作风盛行。或许，时“左”时右在学风方面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实证精神。“空谈误国”非虚言也！

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论十分重要。费老指出，中国的社会研究早先没有把人作为客观对象看待，到五四时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才有了新局面。而社会学自引进之初就提倡“本土化”、“中国化”。费老说，“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既要科学化，又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费老认为，第一条要坚持的仍然是五四时期引进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性。同时，他又特别强调，时至今日，科学地、单纯把社会当作客观事物研究的路数是不足的。这里不仅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费老把问题提得更广阔，认为这是“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问题”，指出了其普遍意义。这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要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土壤，理性主义思路恐怕是不够的。费老在论证这个问题时谈到叩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之道。联系到费老复旦大学潘光旦纪念讲座致辞时讲到的潘光旦先生的“位育”概念。那个概念在用语上源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中庸之道，今天仍然行之有效。这就说明中国社会的研究，单用理性主义思路不够的，费老既认为，第一要坚持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性，又认为要注意另外一面（我体会就是单用理性主义科学作风不够），很全面地阐明了今后中国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应注意的倾向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

王处辉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及问题的看法

如果从康有为 1891 年在广州兴学舍万木草堂讲学之教学大纲中始有“群学”作为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开始时间，中国社会学至今已有 108 年历史；如果从第一本社会学著作在中国出版，即 1902 年章太炎所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在中国出版算起，也已有 97 年的历史（严氏译



《群学肄言》为 1903 年出版)。

社会学在中国的百年史是十分曲折的。前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学发展最快的时期是 30-40 年代；后半世纪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之发展，是在 1979 年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以后。

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 20 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平坦的，但总体发展的规模和已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以往的水平。特别是近五、六年来，高校社会学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了。现在，全国高校已有社会学系或专业 40 多个，社会工作系或专业 20 多个，而且发展势头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的理工农医类在大学开始设立社会学系或专业，这是一个可喜的新动向。

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费孝通先生提出学科建设要有“五脏六腑”之说，经过 20 年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有无“五脏六腑”之说，经过 20 年的发展，而是“五脏六腑”是否健康的问题了。80 年代之初，费先生还提出：社会学的“戏台”已经搭起，下一步是如何唱戏的问题。而现在的问题则已发展到应当唱什么戏、如何唱出高水平的社会学之“戏”的问题了。

社会学界依然存在着诸多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 随着社会学学科的迅速发展，近年又有一大批其他学科的学者转而从事教学和研究，这使社会学队伍进一步扩大了，但同时又出现了第二轮“补课”和师资培训问题。

(2) 学科共同体的建设急需加强。现在社会学界的学术综合实力并不强，但重复劳动和刀耕火种式的、小生产式的学术研究方式造成了大量的学术力量的浪费。这种科学产品生产方式的“不经济”现在还十分严重。

(3) 在一些社会学工作者中，猎奇、自以为是学风较为盛行，而对解放前的老一代社会学家的诸多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屑一顾。其实老一代社会学家们，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曾做卓越的成绩，其中有很多可作为当今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础。

(4) 食洋不化问题还相当严重。外国的优秀社会学研究成果必须大量地吸收借鉴，现在不是引进多了，而是系统地引进还很不够。但是如果一味崇洋，食洋不化，将不会有助于真正的中国的社会学建设与发展。在这方面尚有必要好好向老一代社会学家学习。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等老一代学者，都是很好的榜样。

(5) 真正的“中国的社会学”之理论建树还不多。这本身即说明中国社会学学科尚不够成熟。当然，中国社会学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很好的。上述所有问题都可理解为社会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就不愁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相信在 21 世纪到来之初，中国社会学会会有更为长足的发展。

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动向

用李大剑先生的话说，“横向”地研究社会就是社会学，“纵向”地研究社会学是历史学。但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社会学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就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和研究。费先生在《略谈中国的社会学》一文中曾说，早在 30 年代，英国布朗 (R. Brown) 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时就认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有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比孔德等要早 2000 年 (《从实求知录》第 232 页)。但时至今天，中国社会学者们仍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历代社会思想家们对社会的贡献。这是学科不成熟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要建立真正的“中国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家就必须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掘与研究。解放前曾有潘光旦、龙冠海等社会学家注重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但成果多未发表。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部将它列为社会学



专业必修课之一；国家九五社会学科学基金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列入重点项目之一；中国社会学会也在 1999 年 6 月通过了在中国社会学会下设“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决定。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和专著也已出版了数部。并有几部较大规模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和专著正在写作之中。所以，今后五年间，可能有一批较高水平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问世。

另外，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日见活跃，但研究力量集中于历史学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一定意义，也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颇有意义。但限于社会学界的现有力量和学者们的知识背景，中国社会史近年不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或者说，社会史研究仍属历史学者的一项工作，而不是社会学者能力、精力所及的研究重点。但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则是社会学者必须着力的研究重点之一。

要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要使中国人达到“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学界就必须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发掘研究。而现在的研究力量还是很不够的。

社会学者的双重角色与中国社会学

蔡 禾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系主任

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在使政府和人民超越单纯的经济视野，关心自己、关怀社会、关注环境。因此，社会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但社会学工作者也比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大的来自社会实践的压力，要求社会学家作为专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找对策，社会学的工具性价值成为政府和百姓衡量社会学工作者价值的标准。

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学重建 20 年的积累和逐步成熟，学科自身要求规范化、专业化的压力也在日益增长。讲究研究问题的理论对话、建立假设和检验、追求知识价值的增长，也成为学界衡量社会学工作者价值的标准。

社会学工作者作为专家和学者两重角色之间的紧张不可避免，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是 21 世纪对社会学工作者的要求。孤求专家的角色，社会学不可能在学术之林立足；孤求学者的角色，社会学在中国得不到真正尊重，从而也不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要求社会学工作者有清醒的自觉。

然而，由于每一位社会学工作者所处的工作环境、研究条件、职业压力不同，扮演专家或学者角色的成分就不同。学院派和非学院派差别的出现将不可避免。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历程来看，学院派的形成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二者的差别也使彼此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合作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没有这一点，社会学就会失去自己的队伍。而要达到这一点，则需要相互尊重对方的研究，为双方提供表现的舞台和发表社会学观点的空间。社会学重建 20 年，可以说是撒下了种子，遍地开花。但是，它还没能在各个分支领域里形成一支支相对稳定的研究者群体。可以说，我们现在在许多领域里都有造诣较深的学者和专家，却没有围绕这些领域形成较稳定的研究群体。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在理论建设上的发展速度，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从而使政策性研究也往往缺乏特点。当然这种群体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但意识到这一点，自觉地促进其

